

东北亚研究

东北考古研究

(一)

冯永谦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PDG

《东北亚研究》总序

东北亚目前包括六个国家和地区：蒙古、朝鲜、韩国、日本及俄罗斯的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和中国的东部和北部地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东北部地区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正处于东北亚各国的中心位置，它东和北邻俄罗斯，西邻蒙古，南接朝鲜，隔海与韩国、日本相望。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它自然地应该成为东北亚各国交往的枢纽。在历史上，中国也曾起过这样的作用。汉唐以来，中国长期是东北亚经济文化最先进的国家，东北亚各国间的交流长期是以中国为中心，呈幅射状态。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文化积极影响着东北亚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当时中国也是对东北亚各国各地区最为了解的国家。当时中国有关东北亚各国各地区的记载，至今还是研究这些地区的重要史料，其价值甚至超过他们本国的史料。

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落后了，东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超过了我们。这些年来，反过来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影响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东北亚各国各地区的了解也落后了。有一段时间，不仅我们对东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了解、研究落后于他们本国，甚至我们对自身的了解、研究也落后于东北亚某些国家。这种落后与我们长期的闭关自守是分不开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又再次加强了和东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但是中国在东北亚应有的地位还未完全恢复。我们并不想恢复中国在汉唐时对东北亚的统治地位，我们只指望和东北亚各国建立平等互利的交往，在东北亚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但要做到这些，一方面必须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迎头赶上东北亚的先进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必须加强对东北亚各国的了解和研究，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的。只有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才能为我们更多了解东北亚各国奠定物质基础。也只有加强了对东北亚各国的了解和研究，才能更好向各国学

习,以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只有加强对东北亚各国的了解和研究,才能知己知彼,更好地和东北亚各国联系交往。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认识,总认为我们在研究东北亚各国时必然落后于他们本国,我们拿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成果。但是对任何问题的看法,都有一定的立场观点,各有各自不同的立场观点。今天中国在东北亚事务中日益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中国人站在自己的立场观点来重新认识东北亚的历史和现实,而不是照搬别人的观点,东北亚各国也有必要认真了解研究中国人对东北亚问题的立场观点。没有彼此间新的认识为基础,要建立东北亚和中国的新的关系是很困难的。

因此,我们早就决心加强对东北亚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决心把我国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放在东北亚各国总的发展中来重新认识,决心研究我们在历史上和东北亚各国的交往和所起的作用,并进而研究我们和东北亚各国的关系及应承担的责任。

我们决心系统整理总结我国学者对东北亚的研究成果。弄清我们对东北亚究竟知道多少,不知道多少;过去哪些看法是正确的,哪些看法是需要改进的。也要让国外学者知道中国人对东北亚各方面问题有我们的立场观点,必须了解和尊重我们的观点,我们不会再让别人歪曲和篡改历史,任意摆布我们。我们要用我们的学术成果让大家知道,我们已准备好和各国学者在学术上交流与争鸣。这就是我们编这套书的宗旨。

我们力求在本书中全面反映我国学者对东北亚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观点,但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和一些客观上的困难,可能一时还实现不了我们的想法,但我们有决心再接再厉,最终一定实现我们的宗旨。

孙进己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作者近照

冯永谦 1935年12月23日生,辽宁省沈阳市人。1954年在东北区第二届考古干部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分配到东北文物工作队(后改东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文物考古工作,至今已四十年。现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并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特邀研究员、辽宁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沈阳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还任中国辽金及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秘书长、《辽海文物学刊》责任编辑等。先后发表论文100多篇,专著有《辽宁古长城》(合著)、《东北历史地理》(合著)、《东北考古研究》(一)、《北方史地研究》及研究资料《东北历史地理论著汇编》等多部。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编 汉晋考古发现研究	
一 辽阳旧城东门里东汉壁画墓发掘报告	9
二 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	43
第二编 辽代考古发现研究(一)	
一 三十年来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	83
二 辽宁地区三十年来辽代考古收获	106
三 辽墓所反映的契丹族南徙及其影响	113
第三编 辽代考古发现研究(二)	
一 辽宁省建平、新民的三座辽墓	119
二 北票柳条沟辽墓	145
三 凌源温家屯发现辽代契丹人墓葬	151
四 发掘北票莲花山辽耶律仁先族墓的收获	153
五 法库叶茂台辽墓	163
六 辽宁法库前山辽萧袍鲁墓	191
七 补辽萧袍鲁墓出土的契丹大字墓志铭	209
第四编 辽代陶瓷研究	
一 辽代陶瓷的成就与特点	215
二 “官”和“新官”字款瓷器之研究	241
三 赤峰缸瓦窑村辽代瓷窑址的考古新发现	271
四 叶茂台辽墓出土的陶瓷器	282
五 新发现的辽代陶瓷举要	295
六 山后八军瓷窑非北京龙泉务窑辩	305
第五编 辽代碑志研究	
一 辽史外戚表补证	309
二 辽晋国夫人墓志考	329
三 辽代梁授墓志考	337

四	《全辽文》所收辽宁馆藏碑志校录·····	354
第六编	金元明考古发现研究	
一	金代农村经济生活的重要考古发现·····	383
二	金刘元德基志考·····	387
三	辽宁开原老城镇出土的元代铜器和铁器·····	395
四	凌源富家屯元墓·····	402
五	鞍山倪家台明崔源族墓的发掘·····	416
六	明代管理奴儿干的历史新证·····	456
第七编	辽宁地区考古发现研究	
一	概述辽宁省三十年考古新收获·····	463
二	辽宁近十年来文物考古新发现·····	482
三	辽宁建昌普查中发现的重要文物·····	502
四	志书的编写与考古资料的运用·····	515
五	辽宁地区的历史、民族与民歌发展概论·····	522
	作者自传·····	529
	后 记·····	543

前 言

今天，当编完我的这部《东北考古研究》文稿出版时，蓦然回首，我在考古征途中经过四十个春秋之后，行年即将六十，不觉鬓边白发丛生，虽然不能说光阴虚度，但也实在不敢谈有什么收获了。

不过，在此次编辑本书文稿之时，还是应该说几句话的。那么要谈点什么呢？我想就简略地谈一些我的工作经历和学术研究方面的点滴情况吧！

我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中，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是勤奋的，而且是极热爱这个专业的。由于我自幼就喜爱文史，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包括历代诗文以至各种小说，只要能看到的一律拿来阅读。当后来搞上了考古，加入这个行列，就对此更产生了特别兴趣，专业和我的喜好是那么合拍，我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孜孜以求，我一头钻入到这个新天地中去，处处都是新奇的，在书本上学到的是以前所不知的内容，而地下埋藏即将出土的，更是前所未见的东西，其间似“谜”一样的问题极多，这就吸引我非穷究不可。于是，我乐此不疲。在这四十年的时间里，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山野中度过的，这也是我心甘情愿的，即使对于那些交通不便而又偏僻的地方，当地人都感到苦，而我却不以为然，住下去，一住就是很长时期，直到工作完成。一旦工作结束，又从这个地方转移到条件仍然相同的另一个地方去。总而言之，虽然生活条件还是没有脱离开这种很困难的境地，但我思想上丝毫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适应不了的地方，而是心情愉悦地从事着考古工作。应该说搞考古没有捷径可走，坐在办公室里是搞不了考古的。无论是考古调查，还是考古发掘，都是在野外进行的。尤其是考古调查，常是居无定所，早晨从这里出发调查，一路上背包中装有很重的采集到的文物标本，晚间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真是有车不能坐，有大路不能走，非在荒野草丛中钻行不可。每天爬山涉水，日晒风吹，吃饭不应时，生活是很艰苦的。但尽管是这样我却很高兴，因为头脑中的知识丰富了，掌握的材料增加了。几十年来，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而且直到现在，我还是每年都要出去搞考古调查和发掘，甚至隆冬季节，已经天寒地冻，我还坚持在野外，直到本年度的发掘工作完成才结束返回。

我在学习上,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一个笨招,就是少睡觉,多挤出些时间来。还是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就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每天在夜里十一二点才睡觉,早晨五点钟就起床,直到今天仍是这样,一旦习惯养成了,尽管睡眠少,日里并不觉得困惫。我感到我就是得力于这一点的。我利用这些多争取来的时间,去学习,去研究。我常想,搞考古涉及的面极广,与各种学科都有关系,甚或颇为密切,因为谁也不知道地下会有什么东西,各种文物出土之后,就牵涉到方方面面的知识,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还要知其所以然,这样才能进行研究和阐述,否则就无法工作。所以,这就要求从事考古工作的人知识面必须宽,最低要掌握各有关学科的基础知识。时间本来就紧迫,而工作量又大,自己若不是去挤时间学习,而是有闲心睡觉,那还能进得了考古这个殿堂!我这样认识之后,就如饥似渴地去读书,去查找和抄写材料,积累知识。就是在野外工作时,也不曾稍有懈怠,并且还多了一项任务,就是随时发现,就随地取得它的各项有关资料,比如测图、照相、记录或拓印等。我的学习不仅在基础理论知识、历史文献上,下大力气,去掌握和钻研,就是考古工作本身所要求的技能,也要熟谙。如摄影,是最形象和最真实的现场记录手段,但又不可能随时随地都有摄影师给你完成你所需的各种材料,只有自己精通才是惟一办法。我在最初从事考古工作时,就用了相当一段时间去攻摄影,读了大量有关摄影论著,并且不放弃任何机会去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还注意在基础理论上充实自己。我为了了解摄影原理、镜头焦距和成像关系,掌握光学原理,于是攻读《物理学》,最后到怎样制做镜头,我曾去过光学仪器厂,因焦距和曲率半径有关,这样我因此还涉猎过高等数学。又为了解胶片、相纸以及化学药品的性能,我自学了“化学”。摄影的冲洗配方,多种多样,我都熟读,能背下数十个配方,对不同的药品名称、分子式及所用重量或比例,也都熟知,因此,我在暗房洗印时,有时为了达到某种效果,我根据药品性能,自己随时设计药品配方。为了解决摄影构图,我还学习绘画和艺术理论。因此,我在工作中,不仅承担了当时东北文物工作队的摄影,还承担了以后改名为辽宁省博物馆(包括其前身东北博物馆)的摄影任务。由于我有自己的考古工作,而博物馆的陈列展览等所需要的照片,就都是我用业余时间来完成。我想给文博界的同行提供一个方便,所以根据我的工作体会,在六十年代初曾写了一本10余万字的《考古摄影》的书稿;由于后来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书稿被单位从出版社索回,因而未能出版。再如绘图和测量,我也下了一定的功夫,这也是用业余时间学习的,对各种测量仪器我都能掌握和使用。我在中午从来不睡午觉,即或是三伏天也是如此,尤其在野外工作期间,在炎热的夏日,不宜读书,我就去写生,去画速写。因此,历年来我发表的那些文章中所附的各种测图,都是我自己完成的。作为考古技能,包括器物的修复等等,我都能做,而且是仔细认真对待。我从没把这些工作当成包袱,而是视为对自己的最低的要求,应是最起码做到的事。总之,我学会和掌握了这些技能,工作就方便了,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工作效率。

此外,我在考古工作中,能够较为适应地做了一些工作,还得力于我曾读了五年私塾。这五年时间,从启蒙读本《三字经》、《百家姓》起,直到五经四书,还旁及诗词歌赋,这些我国古代的传统典籍,在我接受这五年私塾教育时都熟读过了。工作以后,经、史、子、集普遍涉猎,读书成了我的嗜好,这里我既从志趣出发,又确因工作需要,其结果是为考古研究的开展,创造了必备的条件。谈到这里,又使我想到我工作以后,所走过的岁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当时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我的学习经常遭到批判,在单位里,长期

被扣上什么“只专不红”、“白专道路”的大帽子,因而被视为落后,此时我也曾感到孤独和苦闷!然而,我爱这个专业,不管受到怎样的打击,我既已踏上这条我愿为之终生奋斗的路,就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当时由于精神上的折磨,我的身体也很不好,但我还是这样艰难地跋涉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这种情况才扭转过来。今天环境变得好了,我的身体也好了,但我的年龄也大了;年青时由于各种运动白白地浪费许多宝贵时光,这个损失是无法弥补了,令人痛心!不过至今我还没有“老之将至”的感觉,我还可以工作二十年,继续把我的研究搞下去。

二

说起我的研究工作,也是有不少变化的。在五十年代初的东北文物工作队时,那时主要是配合工农业基本建设工程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工程进度很快,因而带有抢救的性质。但当时考古工作人员少,而任务量又大,只能是遇到什么性质的文化遗存,就调查和发掘什么性质的文化遗存,谈不到个人有选择地去专门发掘和研究某个时期的遗存,既不管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的各王朝,也不管是汉民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的,只要有遗存而处在工程范围之内,就都会投入全部力量。根据在当时这种条件下的工作,使我认识到有什么任务,就有针对性地学习什么,其效果很好;说句实在的话,假设当时不是这种情况,也不可能一开始就专一,若真的那样做了,其结果就会限制了自己的发展,反过来则锻炼了自己的研究跨度,从早期到晚期,遇到任何一个时期的研究课题都可以适应。六十年代以后,考古队新分配来了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由于在校学习课程设置等原因,一般都搞前段,即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在此情况下,后段又没人去探索,于是我就去搞战国和秦汉魏晋时期。以后又有人搞这段,我看辽金时期遗存丰富,而又没人去做,因之我就转而去搞辽金。封建王朝的考古,难度比较大,文献材料特多,读不胜读,而且还有古汉语这一关,大概这也是很少有人搞这个时期的一个原因吧!直到现在,在我们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后段仍很少有人问津,这种局面是应该改变的。当我看到这种形势,即转移我的研究方向,主动去填补这个空白,这就是我为什么研究这一时期的文章较多的原因。

几十年来,我参加和主持过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地点,为数很多,从地质年代的古生物化石产地,直到明清时期,各类遗址、城址、陵墓、障塞、石窟、寺塔以及少数民族文化遗存等,无不亲身经历过。但就我工作较有收获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历代长城研究,我曾投入一定精力,尤其近几年主要就是从事这项工作。从1986年起,在绥中县九门口明长城遗址,我主持考古发掘四年,这是我国长城遗址第一次大规模地考古发掘。紧接着,在宽甸县虎山明长城东端起点遗址,我又主持考古发掘四年。两地的发掘,都取得了出乎意外的重大考古发现,成果喜人,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我在对历代长城调查、发掘和研究中,对各个时期的长城曾提出一些新的研究意见,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比如存在于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省的范围内,东西相连而成一整体、在今赤峰市北面通过的所谓“赤北长城”,研究者都定它为秦长城;我根据在长城附近出土的遗

迹和遗物,认为定秦长城不确,它应是战国燕长城。同样,在今赤峰市南面东西通过的又一道相同的所谓“赤南长城”,亦有此情况,被研究者认为是燕北长城;我以为这也不准确,它就是秦开破东胡后修筑的第一道长城,其后燕国势力壮大,在今赤峰以北修筑了第二道长城,即“赤北长城”,因其拓展辖地,这才是真正的燕北长城。如果准确地并就长城本身来说,“赤南长城”是前期燕北长城,“赤北长城”是后期燕北长城。“赤北长城”在秦统一六国后,又为秦所利用,经过连接缮治,就成为闻名于世的秦万里长城,但后者是沿用,论其修筑年代不应定为秦而忽略其主要的创建年代属战国燕。前汉初年的长城,还是沿用“赤北长城”的。但前汉武帝时,弃造阳斗辟县地,辖境回缩,长城也应跟着后退,对于这一问题,过去研究长城者未予注意;我根据考古调查,提出了“赤南长城”是武帝弃斗辟县造阳地后重修了战国燕第一次所筑的长城,成为武帝以后的前汉长城。后汉长城,因边郡辖县减少后退,长城也应向内地回缩;我根据考古调查,发现在今辽宁省建平县内从山根村起至炮手营子数十里的墩台,西面与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省相衔接的由墩台和长城相间构成的长城,即为后汉长城。西晋长城,前此研究都认为东端仅到“河北碣石”;我根据文献材料排比,提出其东端还是在朝鲜大同江入海口北岸的碣石山,沿用秦、汉长城旧线。对于北齐长城,研究者都认为它东端止于今山海关;我也根据文献材料进行考证,提出北齐长城东端起点是在今锦州市南面的海边。北周和隋两朝长城,过去研究者认为重修北齐长城,即东端在今山海关海边;我根据考古调查,提出北周、隋长城东端起点是在今辽宁省绥中县万家镇东南面的止锚湾海滨。高句丽长城,过去研究者很少,从不知道其存在形态,虽然文献上有记载,但实地具体行经线路如何,根本无法定位;我根据实地考古调查,不仅指出北从吉林省农安起、南到辽宁省营口海边止的千里长城线,而且第一次提出明辽东镇长城的辽河段南北走向的长城线路,就是高句丽长城,也就是说这段明长城是在高句丽南北走向的长城基础上修筑的,这就使高句丽长城第一次有了形象,并且其走向也具体化了。辽代长城,研究者认为在今丹东地区海边;但根据多方面考察,我仍主张在今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的南关岭。金代长城,分歧较大的,是在大兴安岭西面由额尔古纳右旗库力河起、止于蒙古肯特山东南的两河流之间的沼泽地的这道长城;我们根据考古调查和深入研究,否定了它为建于汉或鲜卑或辽代或成吉思汗等种种说法,提出为金初所修筑。明代长城,这几年我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是在绥中县九门口发掘四年,获得大量地下出土资料,并据以搞出设计,从而修复了万里长城线上的奇观九门口长城,并且又根据发现考证出久已不知确切地点的“一片石”之所在。由于明万里长城东端起点的争论,我在早些时候提出明万里长城东端起点不在山海关而是在宽甸虎山,因而引起随后四年的对宽甸虎山考古调查和发掘,经过实地工作,肯定了明万里长城东端起点,确定在虎山南麓、鸭绿江边。从而恢复了明代“九边”之首的辽东镇长城 2080 里的长城线,纠正了长期以来那种认为明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的错误认识,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使明代万里长城完整起来。以上这些是我对我国东北乃至北方地区历代长城研究的新发现和 new 论点,差足自慰,总算为我国古代长城研究尽了绵薄之力。

对于陶瓷的研究,历来我是十分重视的,因为无论在遗址、城址、墓葬或其他遗存里,都会有陶瓷遗物出土,它数量多,变化大,本身特征明显,是考古研究认识遗存性质的依赖物,而陶瓷鉴定是确定年代的一种基本手段,或者可以说是搞考古研究所离不开的条件。

陶器在新石器时代就产生了，它是构成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除旧石器时代外，各个时期都有陶器，并包括以后的建筑用陶在内，其制作技法、胎质，器形、火候、颜色、纹饰以及釉陶的釉色等，皆有特征，并且表现出因地、因时而异的特点，因而陶器不仅是鉴别一个遗迹年代的基本材料，而且也是区别不同文化的主要依据。瓷器也有与陶器相同的特点，它不仅可以区分时代，而且还可以区分产地和窑场，进而还可以区分某个王朝中的某一个时期，具体而微到这种程度，当然是会受到考古工作者的青睐了。我在陶瓷研究中，虽然范围较广，但主要是对辽代陶瓷作了较多的探索。因为辽代陶瓷过去还不为学术界所熟知，存在问题自然更多。比如对官窑的问题，学术界普通持否定的态度。到底辽代有没有官窑？一直困扰着研究者。我搜集国内外有关“官”和“新官”字款的瓷器，又去辽地窑址进行考古调查，经过认真研究，提出与陶瓷学界否定辽有官窑而定那种划“官”字款的瓷器为宋代定窑产品的不同意见，认为这种划款瓷器，一部分为唐末与五代时期官窑产品，并且将其出现时间较前此研究者所确定的年代提前许多，对另一部分划款瓷器则定为辽代官窑所生产，而且辽代官窑也如中原王朝那样有“官”和“新官”之别，并又进而确定辽代官窑就是今赤峰县缸瓦窑村瓷窑址。此外，还对辽瓷烧制时间以及辽代陶瓷特点等问题，也都作了一些讨论。

历史地理的研究，从来受到重视，这也是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因此，历代不乏名家，尤其明清以来，成就更大。但历史地理内涵包容极广，现在需要探讨的问题仍然很多，有些课题还未曾触及。我从考古研究的角度看，历史建置沿革地理就存在很多问题，迫切需要解决，而且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其他许多方面研究的基础。因此，我在考古工作中，随时注意，积累材料，深入探求，对战国、汉、唐以至辽金等朝代的建置，都提出了不少新的论点，阐述前此研究中出现的失误。我在这方面的研究优势，是能够自己亲自到现地去看，在有了深刻的感性知识后，再结合文献材料，加以分析判断，因而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更接近实际些。像辽代瀋州的发现，如果不是亲自到现地去，就是不可能完成这项研究的。其他许多城址也都有这种情况，文献记载如果不能与实地山川道里相符合，怎能得出正确结论？田野工作的锻炼，使我不避跋涉之苦，凡是能去的地方，我都争取亲自去，有了直观印象，再运用考古手段，并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去研究，这是我多年从事历史地理研究所遵循的一个原则。

对历代遗存的考古发掘，我做的也比较多。几十年来，我没有停止过田野工作，始终进行着调查与发掘，其范围从石器时代以迄明清时期，并包括边疆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遗存，这里既有遗址，也有墓葬，但墓葬更多一些。在本书中，就我所写并已发表的这些汉晋以来的调查或发掘材料，可以看出有很多是颇为重要的发现，其历史与科学价值极高。如所发现的许多文物，经国家鉴定，已被定为一级品，就是说，这是属于“国宝级”的文物，非常珍贵！谈到这里，我想说一下考古发掘中，对这些珍宝的获得，稍有疏忽，就可能功亏一篑；而凡事谨慎精细，也可能将略有粗心就毁坏掉的文物保护下来。像法库叶茂台（七号）辽墓出土的两幅绢轴画（山水楼阁图、竹雀双兔图），在发掘当时，墓中阴暗潮湿，并且也不知道在木构棺床小帐内侧山墙与石棺两端极小间隙的泥土中，有坠落的绢画，人是根本无法进到这个地方去的，是我侧身躺在墓中石棺外壁与棺床小帐间狭窄夹缝的潮湿泥土上，双臂作直角伸出先后在帐内、棺两端的泥土中，细心剥离，最后完好无损地剔取出

来,成为稀世文物,使埋藏千年而极易损坏的瑰宝保存下来。我十分欣慰!我的工作可以说,上不愧于祖先,下不愧于后人,我为有这样的许多发现感到自豪!

在我的考古研究中,还注意用出土资料补充历史文献记载之不足。其实,这项工作也是考古研究的基本功能之一。我在历年工作中,随时注意及此,每有发现,均及时指出。这里值得说明的是,我用出土墓志材料,补证讹误错乱严重的《辽史·外戚表》,是收效较大的一项研究,使原来世系无法衔接、行辈误升误降等问题,得以纠正,而后族原始也弄清楚了,同时还发现很多后族萧氏的重要人物,补充到“表”里来。因此,以后再了解辽代后族或是再读《外戚表》,即能一目了然。又如用金刘元德基志进行考证,使自五代以来燕王刘仁恭一族世系,上下贯通,直到金代,这对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历史也会有所裨益。

三

在这部《东北考古研究》中,将我四十年从事文物考古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凡是较重要的都体现出来了(还有另一部分成果,编在《北方史地研究》一书中),当然也还有一些篇目未编入。为了便于了解,我将本书分成七编,或按专题,或依时代,即每编是一个内容,可供读者了解、研究。

在这次编辑本书时,对本书篇目重新作了一些编排,文字也相应作了一些调整和修改,并有所增删。

此外,本书文字因当前排版系统均为简化汉字,故本书引用文献材料或出土墓志等文字资料,对其中繁体字或别字、异体字等,一律改为现行辞书规定的标准简化字。这些情况于此特为说明,以便读者了解。

我的这本《东北考古研究》即将出版,既高兴又有些不安。高兴的是,这四十年我总算没有韶华虚度,为祖国的考古与历史研究做了一定的贡献,取得点滴成就;但同时也确感不安,因为做的还是很少,并且限于学识水平,我的这些研究论点是否正确,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总之,深知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惟诚恳地希望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冯永谦

1993年12月30日夜

于沈阳 乐知堂

第一编

汉晋考古发现研究



一 辽阳旧城东门里东汉壁画墓发掘报告

1983年11月6日,辽宁省辽阳市旧城东门里文庙街居民在庭院内建永久性菜窖过程中,发现一座石板支筑的壁画墓,辽阳市文化局和省文化厅闻讯后,即至现场调查,并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随即,辽宁省文化厅通知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与原辽阳市文物管理所对此墓进行清理,并对壁画作了临摹。壁画墓的清理工作,于11月16日结束。

(一)墓葬情况

这座壁画墓位于辽阳市原明代旧城东墙南端平夷门南75米处的城墙内侧墙基下(图一)。城墙已铲平,地表下还保存墙基2.15米。墙基底部再下0.6米即为壁画墓的墓顶石板。石墓上部因有高大的城墙,并经过夯打,墓顶石板有数处断裂。墓葬地面因是辽阳旧城的城垣,已无封土痕迹。但地表下墓室周围的土层均保持原状,在城基下的墓顶部仍可见到厚0.35米的夯土层,夯层厚25厘米,是残存的建墓时的原封土,因此可知此墓原是有封土的。

墓室平面呈“T”字形,方向南偏西10度,由东、西棺室和明器室组成。墓内通长3.60、宽3.10、高1.54米(图二——四)。

墓门在南壁,分左右两门洞通向棺室。墓门通宽2.35、高1.2米。墓门上架门楣,下横门槛,左右两边各立石条门框,门槛外铺条形石板,门用三块石板由外边封堵。墓门外部墓顶上用灰色绳纹长方砖砌成“凹”字形翼墙。

墓室用淡青色的南芬页岩石板支筑,白灰勾缝。建墓所用石板打制规整,壁面较为光滑,构筑坚固。两壁采用整块石板,下面铺石板作基底,上面横搭石板为墓顶。墓室内中部纵向立一列三根高1.15米的窄石条作柱,柱下部垫一与墓室等长的长方形石条,柱上部各托以方形石块为斗,斗上承托纵梁,梁上横铺石板为墓顶。石柱将墓室隔成东、西两室,由石柱间隙处相通。棺室长宽均2.55、高1.54米,东棺室宽1.45、西棺室宽0.95米。

明器室在墓室后部,两端长出棺室。明器室底较墓室底高起50厘米。底亦铺石板,前部中间立一扁石柱,下垫方形石础,上托方形石斗,斗上承横枋,枋两端搭于墓室左右两壁

上。明器室宽 3.10、进深 0.95、高 1.05 米。

两棺室中置石板尸床。尸床与墓底间用扁平石块垫高 10 厘米。西棺室的石板尸床系一块整石板，其大小几与棺室长宽相等，厚为 8 厘米；东棺室的尸床为三块石板，右边的一块较大，左边两块较小。在头骨旁均有白灰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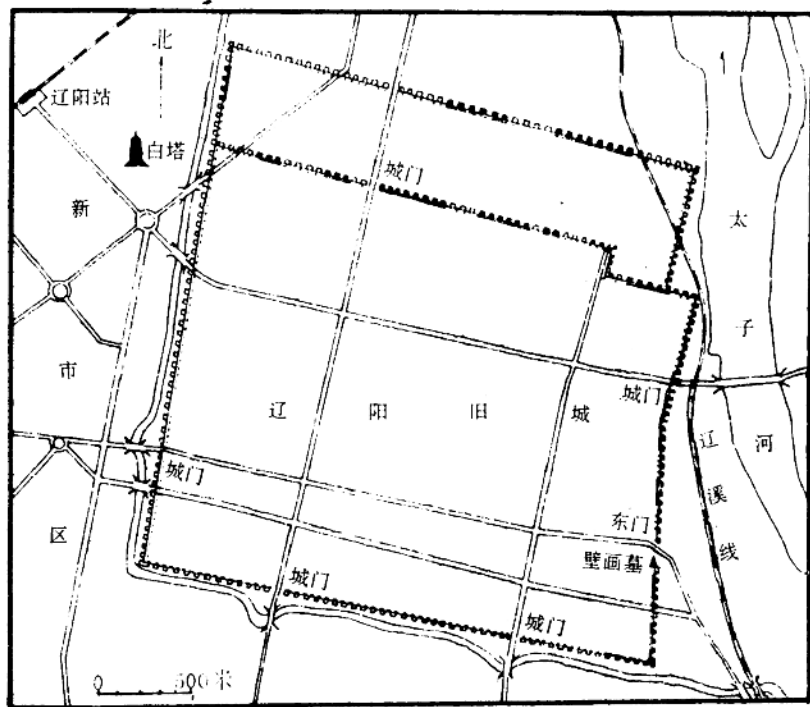
东棺室左(东)侧尸床上满铺白灰，厚约 3 厘米。在白灰面上有席纹痕迹。据此可知，入葬时在石板尸床上铺防潮的白灰，白灰上再铺一层席，用以敛尸。东棺室右(西)侧尸床上亦铺一层白灰，上葬人骨架 1 具，已腐朽，现仅剩有头骨残片和下肢骨，可辨出头北足南，由出土铜镜看，似为一女性。

西棺室葬有人骨架 2 具。一具骨架保存完整，为女性，在右侧，头北足南，仰身直肢(图五)，年约 50 岁。另一具仅存残碎头骨，已非原位，其余骨殖已不存。

从出土人骨看，东棺室的左边尸床低矮又比较小，可能原葬儿童骨骸，已不存。两棺室的右侧所葬均为女性，西棺室左侧所葬人骨可能为男性。据此推知，此墓应是家族墓葬，儿童为附葬于其父母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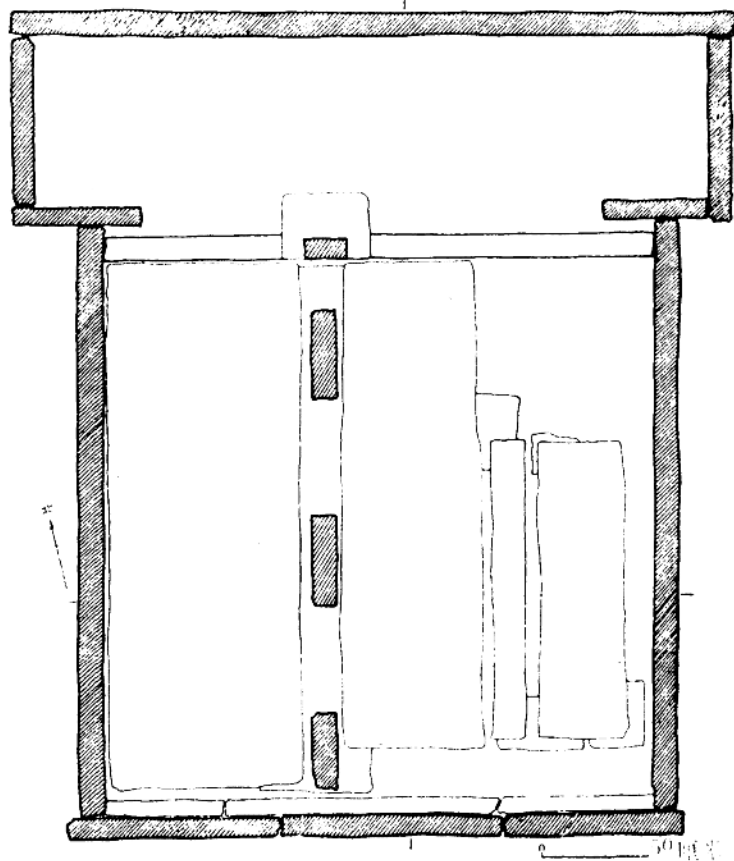
(二)随葬器物

此墓未遭受任何扰乱，随葬品不仅保持原葬位置，而且大多完好(图六)。随葬品计有



图一 辽阳旧城东汉壁画墓位置图

陶、银、铁、漆器和铜钱，共 35 种 72 件（“五铢”铜钱 117 枚以一种 1 件计算），以陶器为主。因此墓系家族合葬，随葬品应该不是一次葬入的，从遗物种类、数量看，很可能是两次随葬。但是放置却很有规律：在墓室后部的明器室内，东半部是饮食起居的生活用品，如陶灶、甗、甗、勺、井、水斗、壶和罐等；西半部主要是祭奠器皿（图七），如仿漆器的陶案、耳杯与钺、魁、盃、套盒、奩等；而一些比较贵重的或墓主生前实用的物品，如漆盒和铜镜等则置于头旁，钱币放在手边。墓门口的几件陶器（包括东棺室近墓门处的残陶片）当是最后一次入葬，在封堵墓门时放置的。



图二 东汉壁画墓结构平面图

1. 陶器

计 29 种 62 件。大多为泥质灰陶，少数为泥质黑灰陶。陶质细腻，火候较高，因此硬度较大。制作方法，除耳杯、器耳和器足等模制，较难成型的器物辅以手制外，其余圆型器都